



文史哲博士文丛

◎ 程勇 著

汉代经学文论 叙述研究

齊魯書社

本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及孔子文化大学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

© 程勇 著

汉代经学文论 叙述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程勇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4

ISBN 7-5333-1479-4

I. 汉… II. 程… III. 经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131 号

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

程 勇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479-4
B·188 定价: 20.00 元

序

蒋 凡

捧读程勇博士《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书稿，为其酣畅淋漓的恢宏气势所摄服。程君形象魁梧，性格阳光，为人开朗热情，广结人缘而以助人为乐，所以朋友戏称他有大将风范。现读其大著，又实在地感受到书如其人，文章气势朝气蓬勃，同样具有大将风度，不仅是融贯中外古今，学殖笃实深厚，而且视野开阔，思辨灵动而举重若轻，通过具体而微地解剖形而下的“麻雀”，把艰奥繁复的学术课题，升华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去作规律性的探索，并且能够在生动明白的文字中，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进了一个新的学术洞天，饶有兴味地继续耕耘和探索。

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但又非常艰难的学术课题。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程君选择这一难题，跨越了先秦两汉史学、经学哲学、政治伦理、文化机制、文人心态以及文学创造、文论叙述诸多学科领域，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再细小的问题，也必须精神贯注、全力以赴。在表面上，这一课题讨论的似乎只是汉代文论发展的问题，作者从本原论、动能论、创造论三个方面，对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与论证，当然有其时代阶段性。但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由此及彼，跨越了具体的历史时

段，把远大的目光投向了整个中国古文论研究领域。比如说，过去的中国古文论研究，存在着解释型的模式，它把“古代文论”主要作为知识对象看待，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古文论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处于草辟鸿蒙的时代，知识的发现与积累当然是需要的。但发展到 21 世纪，学人如果仍然以解释型模式的研究为领军主流，这就很不够了，甚至可说是一大缺陷。积累历史知识，必须为人所用，才能成为新文化的活肌体。光解释和积累，而不去注重活用，就会成为两脚书橱而致人诟病。面对这一学术困境，程君认为应该与时俱进而转变观念，在解释型的基础上突破，继续深入探讨朝创造型研究思路跃进的问题。其所称“创造”，就是把古代文论“作为智慧源泉来看待，其目的在于沿其所开辟的道路将文化创造下去”。从解释型模式的重“知识”，发展到创造型思路重“智慧”，从字面看，似乎意思相近，实际不然，这是思想在不同层面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知识”不用，就是死的魂灵；“智慧”鲜活，开启了创造新文化的源泉。源头活水，汇聚江河，滔滔滚滚，一往无前，永远滋润了人类文明。程君据此，进一步提倡将问题研究作为起点，“真正的问题是有关于我们存在的问题”。作者所言，启人深省。只有活用知识、超越知识，才能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学术春天。在理论观念、方法途径及问题的提出、转换与探索方面，程君所言，高屋建瓴，这对现在与今后的古文论研究建设，应该是大有启迪与助益的。

在鲜活的宏观理论指导下，程君对于具体存在问题的历史研究，颇多斩获创新而启人思维。人或担心这是否会重蹈昔日

· 2 · “以论代史”的学术覆辙？其实，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

程君所走，是“以论带史”而非“以论代史”的路数。“代”之与“带”，一字之差而性质判然有别。“代”者，包办代替者也，所谓“以论代史”，即徒发空论而无须顾及历史事实。这一不良学术倾向，不仅在“文革”前，即在今日也仍然风行不泯而仍有市场，因为它为“聪明”的思想懒汉准备了商业炒作的学术快餐。但程君是“以论带史”，“带”者带动启悟者也，它立足于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来说话，并提高到理论上作规律性的总结与升华。作者曾清楚指出了“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文学本质，也不存在某种通行天下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比如，作者论述儒家文化立场，从先秦到两汉，经历了从“民间文化立场到体制文化立场”的转变，由于时代发展及思想立场的变化，造成了两汉视野中有“经学”与“经术”之别。“学”的具体目的在于“通经”，“术”的目的在于“致用”。“经学”指向儒家经典的一般精神与意义，其中包含了个人修养与人格精神，而与知识分子的民间文化立场相对应。而“经术”则指向了实际政治实践，具有直接的统治教化的功利目的，“而与知识分子的体制文化立场相对应”。对于两汉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人徘徊于两种思想立场之间的矛盾与尴尬，所论言简意赅而一针见血，具有震聋发聩之功。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经史基础，而是就文学论文学，能有此精见卓识吗？又比如有关汉代谶纬文论叙述的研究，尤见精神。有关谶纬神秘之学，学界视为畏途。但程君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克服种种困难，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终于从无知到有知，成功地写就了《儒教神秘主义言说与谶纬经学文论叙述》，为其整部大著，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谶纬是两汉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谶纬文论叙述是一种政治

神话论类型的文论，则文（学）便是神灵启示录，儒家经典就是这样的神灵启示录”，谶纬中有关“诗”“书”“礼”“乐”的文论叙述，皆以王者受命于天为理论根据，“其最终指向的是现世实现宗教化的德治国家”。这就准确破译了谶纬文论叙述的密码，把神秘谶纬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脚踏实地的人间，以显现其本质面目。这类破解学术难题的创见，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其功厥伟，岂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游根之论所可比拟！

程勇博士驰骋学坛，本书是小试牛刀，即在学术领域跨出了坚实的一步。相信他在今后漫长的学者生涯中，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必然是百尺高楼，更上一层楼境界，我辈将翘首以待。

2004年12月18日

于海上半万斋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文化立场的整体转折与儒家文论叙述转型	6
第一节 问题、方法与研究主旨	6
第二节 儒家文化立场的整体转折	19
第三节 儒家文论叙述的转型	29
第二章 经、经学与汉代儒家文论叙述	47
第一节 三种经学论与思考的进路	47
第二节 经典的圣化、国家化与文化权威的成型	50
第三节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知识阶层的生存姿态	64
第四节 经学与汉代儒家文论叙述	81
第三章 儒家意识形态缔造与今文经学文论叙述	93
第一节 今文经书与今文经学	93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与信仰	100
第三节 今文经学大一统的文论构型	111

第四节 《礼》《诗》《春秋》释义引领的文论叙述	131
结语	164
第四章 儒门经典系统重建与古文经学文论叙述	167
第一节 古文、古文经与古文经学	167
第二节 古文经学思想风格之成立	177
第三节 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及文论视野	184
第四节 古文经学文论叙述的基本构架	201
结语	217
第五章 儒教神秘主义言说与讖纬经学文论叙述	220
第一节 作为儒教秘言知识论的讖纬经学	220
第二节 讖纬经学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232
第三节 讖纬经学文论叙述的基本构成	245
第四节 《诗纬》传达的《诗》学理论	259
结语	281
参考文献	283
后记	294

引 言

创立哲学诠释学的加达默尔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① 这一关于意义阐释的理论，提醒实际上在从事着古代文学批评史建构的当代研究者，必须对作为解释者的自我，以及那些生活于相当遥远的时代中的思想者的置身处境——他们既是面对前代思想材料的解释者，又在我们的视野里成了解释的对象——予以存在论意义上的先行理解。尤其是当我们不仅试图通过专业性的研究，为批评史的知识系统再增加一些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发展的知识，还试图以此理解有关我们自身的重大问题——例如人文知识系统的形成与更新、个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更其如此。

^①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80页。

因此，本书首先是从反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传统开始的。我希望通过对创造型文论研究类型的构想，探讨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播撒到当下生活世界中的方式；而且，我以为，这也可能更合乎那些为我们留下如此丰富的思想材料的人们的心意。这就使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和写作试验，书中对“文论”与“文学理论”所作的类型区分，“经学文论叙述”的提出，以及对“文（学）”这一略显陌生的表达方式的运用，也就有可能是偏颇的一孔之见。对创造型文论研究的构想也便同时构成了本书将经学与汉儒文论叙述的关联作为讨论对象的选题依据，因为对于旨在进行文化规范的古代文论的创造者来说，儒家经学便是最大的文化传统，而两汉正是确立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对于儒家文论来说，两汉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期。从此，那些对于先秦儒者思想论说的创造性诠释便凝固为新的传统，等待着后来者在新的历史处境中产生兴趣。

但这一传统又是在知识、思想与权力结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得以确立的，有些问题是极为显明的，例如：那几部散佚不全的书籍，怎么就成了只能在信仰层面上接受的“经”？那些据说蕴涵于“经”中的关于社会、人生、文化的意见，怎么就成了只能遵循而无可置疑的“恒久之至道”？儒家知识分子对此“恒久之至道”的种种解说，其真性是怎么证成的？既然都宣称承传自孔子之类的圣贤，又怎么彼此排斥诋毁？那么，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深入到历史的隐微处，从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着手。为此，我尝试提出了“民间文化立场”和“体制文化立场”、“泛指经学”与“特指经学”、“经学”与“经术”、“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这样一些对举的概念，以便利于

分析；而且，虽然本书所使用的汉代经学的基本架构还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讖纬学”，但颇有一些具体分析溢出对汉代经学史的习惯理解。也正因此，本书不得不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经学问题，这使得本书看起来很有些偏离了“文学论文”的既定写法。

这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是我对中国文论的整体理解。在我看来，“中国文论”不仅指涉外延大于“西方文学理论”，而且在看待视野上两者更有不同。相较而言，“中国文论”乃是一种旨在进行文化规范的文论类型，虽然其中也存在着“文学理论”的解释路向，甚至可能从那些吉光片羽的思想材料中梳理出一条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审美主义的“文学理论史”的线索，但不能以“文学理论”的视域遮蔽“中国文论”整体。中国文化虽然也在逐步地趋于分层化，因此带来了学问类型的细致化，但就总体而言其浑融性远大于西方文化。例如，就艺术类型而言，西方文化更强调艺术类型之“异”，而中国文化更强调艺术类型之“同”，如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书画同源”等命题所指涉。我们看到，在两汉儒家，形成于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文化类型，都一股脑儿装在经学的筐子里。既然如此，谈置身于经学语境中的儒家甚至整个汉代文论——有学者便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时代的文论”，就汉代文论的总体特征而言，这种概括是恰当的——又如何可以置经学于不顾？又如何可以仅对经学背景泛泛而谈？更何况我们对经学还存在着许多误识呢？

其二是我对植根于经学语境的汉代儒家文论的整体理解。我把它区分为两个层面，强为之言，则是“经学文论叙述”与“经学视野中的文论叙述”。后者以前者为依据和本原，前者则

是汉儒在对作为圣人垂范之“文”的经典文本的释义过程中引领出来的对于“文”的看法和主张，那些涉及“文”的本原、功能、创造方面的叙述本身即是经学的有机构成，它显明地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文教制度的整体构想中对文化创造进行规定和规范的努力。也正因此，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经学文论叙述”的形成，具体说来就是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思想背景却又分属不同学派的三类儒家知识分子，在皇权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本原性立场的纠缠中，以争夺国家文教制度的解释权为轴心，以不同话语方式进行的大致相同的文论表达，这便是今文经学文论叙述、古文经学文论叙述以及蕴涵于讖言纬语中的经学文论叙述。至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详细讨论以经学为学问基础、思想前提和意识形态语境的汉儒关于诗、赋、楚辞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从“经学文论叙述”中转出的，本书暂不能涉及。

本书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是本书的导论，在反思 20 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关注问题、研究思路与主旨，并就从先秦至两汉儒家文化立场的转折，以及与此转折相伴随的儒家文论的转向，做一提纲挈领的整体把握。第二章讨论经学与儒家文论叙述的关联，当中包括不少复杂的问题，如儒家经典的圣化、国家化与文化权威的成型历程与构建方式，知识分子沿经学、经术的不同看待视野展开的生存姿态，依经立论的汉儒文论的基本叙述方式，希望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梳理和讨论，为后面更为具体的讨论奠定论说基础。第三章讨论今文经学释义学引领出的经学文论叙述，论及对今文经术与今文经学的理解、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和信仰，并以董仲舒为典范还原今文经学大一统的文论构型，也将梳理在《礼》

学、《诗》学、《春秋》学中蕴涵着的文论叙述。本章的论说中心是今文经学对意识形态的重组以及相应的文化创造规范。第四章讨论古文经学释义学引领出的经学文论叙述，论及对古文经学的理解、古文经学思想风格的成型，重点讨论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及其显现出的文论视野、毛《诗》学蕴涵的古文经学文论叙述的基本构架。本章的论说中心是古文经学对儒家经典的重读以及相应的文化创造规范。第五章讨论谶纬学中蕴涵的儒家文论叙述，论及如何理解作为儒教秘言知识论的谶纬学，梳理杂乱无章的谶言纬语中体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并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诗”“乐”的谶纬材料重构出统摄这些材料的文论构架，特别对《诗纬》中的《诗》学理论做了梳理和讨论。本章的论说中心是以神秘主义言说表达的儒家文化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神话论的类型的文论叙述。

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然我满怀敬畏地对待本书的结撰，全书所有引文皆经核实，详列出处，也希望能通过本书如其所是地勾勒出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的整体格局，以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还原的方法澄明经学文论话语的构建方式与生成途径，但自知限于学力学识，书中多有偏颇舛误，恳请读者诸君多予批评教正！

第一章 文化立场的整体转折 与儒家文论叙述转型

第一节 问题、方法与研究主旨

大陆知识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初。大体而言，对“中国古代文论”问题域的圈定、分割及由此展开的愈益专门化的细致研究，并非文史哲合一的中国传统学术内在理路之必然结果，而是置身于现代性进程和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性思路和话语系统为旁鉴，对“民族性的现代性”这一历史绽裂出的切身问题予以呼应和解答的附带产物，其核心问题乃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与之相应的就是运用基于西方“文学理论”的话语架构，以整合传统“诗文评”、“戏曲小说评点”等思想材料，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审美主义倾向。^①就学术本身而言，其直接的结果是在中国知识界造就了一种新的学科类型，以及随着学科体制化、知识专门化、研究职业化而形成的一大批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彼此之间具有充分自觉的专业定性与界线分

^① 可参阅刘小枫在《审美主义与现代性》一文中对“现代中国美学研究”的讨论，见其《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299页以下。

明的疆域感，以及随着学科建制的日益庞大而渐渐显露的对于这一学科原初意义的遗忘。相当数量的专业研究者满足于在既有的学问构架中辛勤积累“古代文论”“知识”，似乎很有道理地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自居，为此甘愿忍受被几乎全社会冷落的寂寞、无奈——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是个人情绪，而是相当普遍的职业心理。

在20世纪后20年普遍的学术反思思潮中，研究者在系统回顾“古代文论百年研究史”时，开始反思“古代文论”的学科性质、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一时间云蒸霞蔚，议论蜂起，至有尖锐的批评：“除了一些简单的以古证今，古代文论是否因为独特的理论形态而成为当代文论的重要参照？除了引证一些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古代文论是否还能提出一批独特的范畴作为当代文论的支柱？”“看待古代文论的时候，保护历史遗迹的想法还远远超过汲取理论养料的需要。迄今为止，古代文论所表现出的理论价值还不足以强烈地打动当代文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文论所必须扎根的一方土壤。”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感而累及古代文论；二是“欧洲文化中心”的尺度无形地贬低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意义；三是许多古代文论的理论观点无法和当代文论所关注的问题衔接起来，古代批评家的思想很少用当今的理论语言加以译解而纳入当代文论的视线范围（南帆，1984，1990）。中国文论研究患了“失语症”，“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和目的，则是经由“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在21世纪这个“世界各民族文化大对话的时代”，“为世界贡献一套新世纪的文学理论话语体

系”（曹顺庆，1996）。开始接触到一些本质性的问题。^①

在我看来，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同样是在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驱动下进行的，是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建设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渴望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里的投射，其中既有将“古代文论”作为纯粹学问而进行的思考，也有将“古代文论”作为意识形态创造而进行的规划。虽然其中或者可能孱杂了重新分配话语权力和学术资源的心态，或者可能因后殖民文化理论的浸染而呈现出某种民族文化保守主义情绪，但那些旨在追究研究意义的辩驳讨论，的确有助于我们在进入“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前先行确定进入的通道，也有助于我们进行原创性思想的创造，因为“一个致力于‘原创’的思想者或学者，首先必须对既定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保持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尤其要对自己信奉的、不假思索遵从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保持审视和批判的眼光，特别要在哲学层面上对自己信奉的思想保持批判的眼光”（吴炫，2000）。

若从研究类型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以为实际上存在着解释型与创造型两种模式：前者将“古代文论”作为知识对象来看待，其目的在于努力将其解释清楚；后者则将“古代文论”作为智慧源泉来看待，其目的在于沿其所开辟的道路将文化创造下去。后者看起来类似“求用”的思路，但实质上有所不同：“求用”的思路认为“古代文论”中已经存在着为今日所需的价值，因此问题在于怎样找到传统与现在的接榫

^① 学界90年代反思古文论研究的具体情形，详见拙文《对九十年代古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载《江淮论坛》2001年3期。